

陕西乾县夹道村秦墓发掘简报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

摘要：夹道村秦墓发掘在乾县上述首例，填补了该地秦墓葬空白，亦扩大了关中地区秦墓分布范围；已发掘的4座小型秦墓年代跨越战国早期至晚期；M3“同穴合葬”为研究战国时期葬俗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。结合文献记载，这批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与战国秦置“好畤邑”的历史背景有关。

关键词：乾县 战国秦墓 发掘

夹道村墓葬位于乾县城西的夹道村东，漠谷河西岸台地之上，东北距乾县县城约2.5公里（图一）。



图一 夹道村墓葬位置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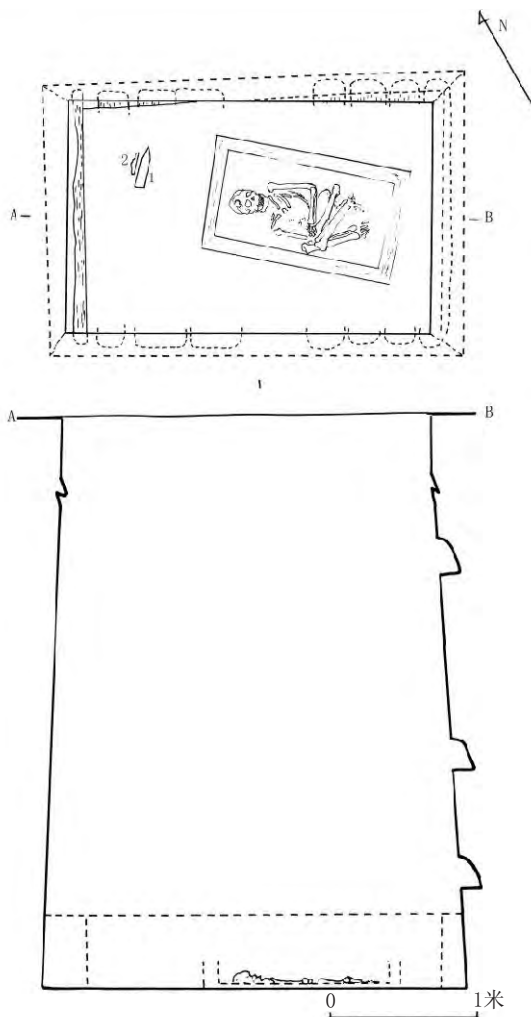
为配合西（安）平（凉）铁路（陕西境内）建设工程，2010年8-10月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乾陵博物馆联合组队，并在乾县文物旅游局的鼎力支持下，对位于夹道村的五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其中M1为唐墓，其余皆为战国秦墓，M2、M3与M4、M5分别位于209省道南、北两侧，相距约150米。现将此次发掘的秦墓情况简报如下。

贰号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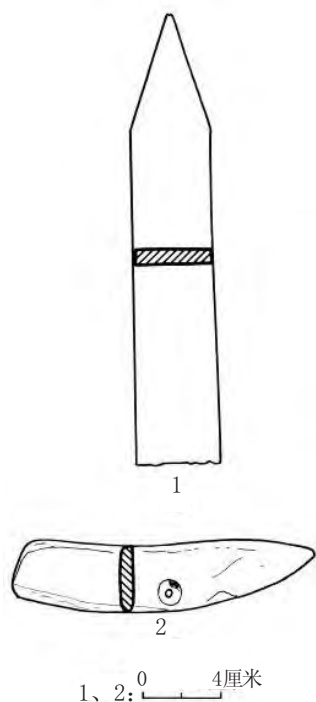
M2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，方向300°。墓葬总体口小底大，墓口长2.5、宽1.6、深7.4米，墓底东西长2.9、南北宽1.8-1.9米，填土经夯筑，墓圹东南角的东壁、南壁上各有一排脚窝。

墓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，东宽0.14、南宽0.15、西宽0.27、北宽0.15米。葬具为一椁一棺，木椁长2.58、宽1.74、残高0.5米，椁盖板横向放置，二层

台上残存迹象判断宽度在18-34厘米；木棺长1.34、宽0.8米，高度不详。墓主为男性，头向东北，面向上，仰身屈肢，双臂置于胸前，双手环抱交叉于腹部，下肢两腿并拢，胫骨向后弯曲，贴近臀部。出土



图二 M2平、剖面图
1. 石圭 2. 石刀



图三 M2出土器物

1. 石圭 (M2:1) 2. 石刀 (M2:2)

器物有石圭和石刀2件，位于墓室西北角棺槨之间（图二）。

石圭 1件，M2:1。青石质，锐角三角形圭尖，体长方形，长22.7、宽4.4、厚0.8厘米（图三，1）。

石刀 1件，M2:2。青石质，弓背、直刃、三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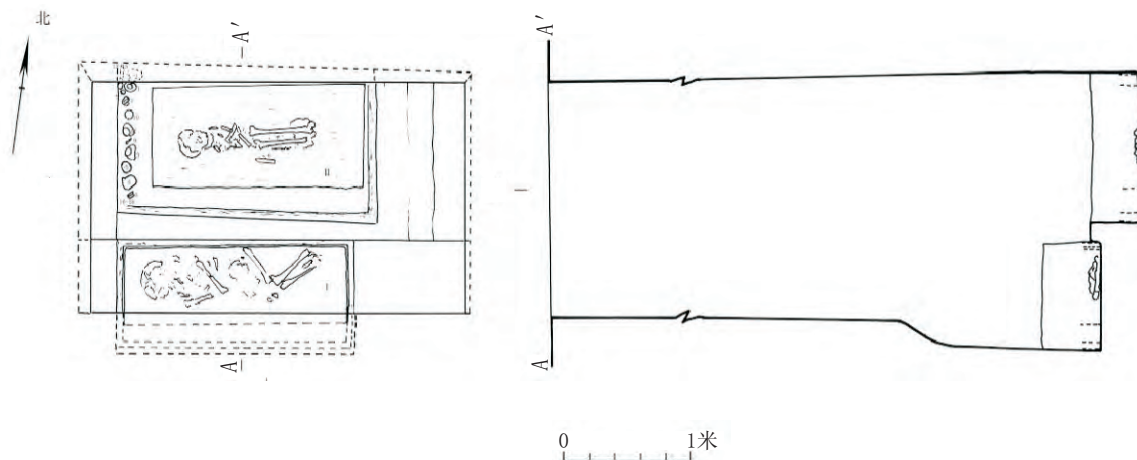
形尖，上部有一两面对穿圆孔，长15、最宽3.6、厚0.6、孔径0.3厘米（图三，2）。

参号墓

M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，方向265°，东西长3、南北宽1.96、深7米，底部略大，东西长3.14、宽2.3米，墓葬填土经夯打。墓室内随葬两具人骨，I号人骨位于墓室南端，葬具为一椁一棺，四周为生土二层台，椁长1.9、宽0.86米，木棺北邦板紧靠木椁，东西长1.8、宽0.64米，高度不详。I号墓主仰身屈肢，双手环抱于胸前，双腿并拢侧屈，女性，无随葬品；II号墓主葬具同为一椁一棺，四周为生土二层台，木椁长2.06、宽1.1米，木棺长1.7、宽0.82米，北紧靠木椁。墓主为男性，仰身屈肢，头向西，面向上，双手环抱于胸前，下肢卷屈折于胸前。随葬品石圭位于棺内墓主南侧，鼎、簋等随葬品位于墓室西部棺槨之间，主要有陶鼎1、陶簋2、陶豆2、陶盆1、陶盘1、陶匜1、陶板4、陶圭4，另有铜带钩1、石圭1等18件（图四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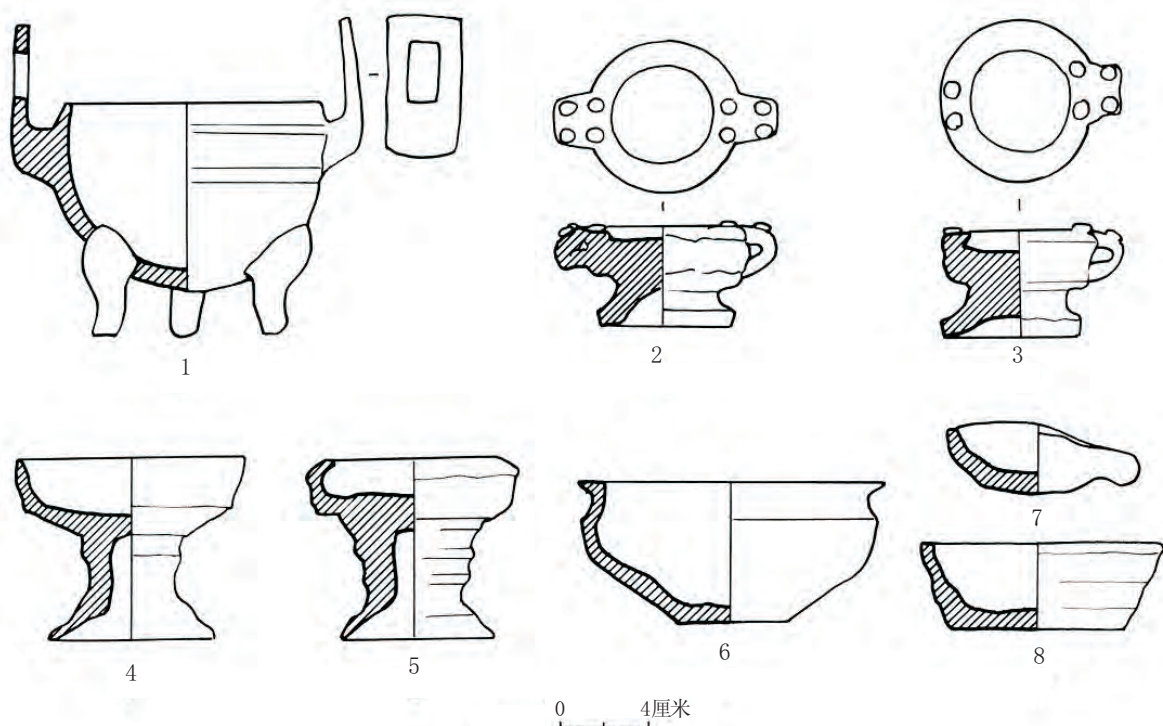
鼎 1件，M3:4。泥质灰陶，直口，方唇，卵圆形深腹，小平底，三蹄足。长方形附耳，附耳上有长方形孔，腹上部有两道凹槽（图五，1）。

簋 2件，M3:13。泥质灰陶，敛口，方唇，斜平沿，器腹略深，斜折外腹，束腰，喇叭状圈足，扁平环耳，耳孔较大，上有四个圆泥钉。通高4.4、口径6.8、底径5.8厘米（图五，2）。M3:11，泥质灰陶，敛口，方唇，斜平沿，器腹较浅，底近平。外腹斜



图四 M3平、剖面图

1、5.豆 2.盆 3、11.簋 4.鼎 6、16-18.陶板 7.泥器 8.石圭 9.铜带钩 10.盘、匜 12-15.陶圭



图五 M3出土陶器

1. 鼎 (M3:4) 2、3. 簋 (M3:13; M3:11) 4、5. 豆 (M3:5; M3:1) 6. 盆 (M3:2) 7. 匱 (M3:10) 8. 盘 (M3: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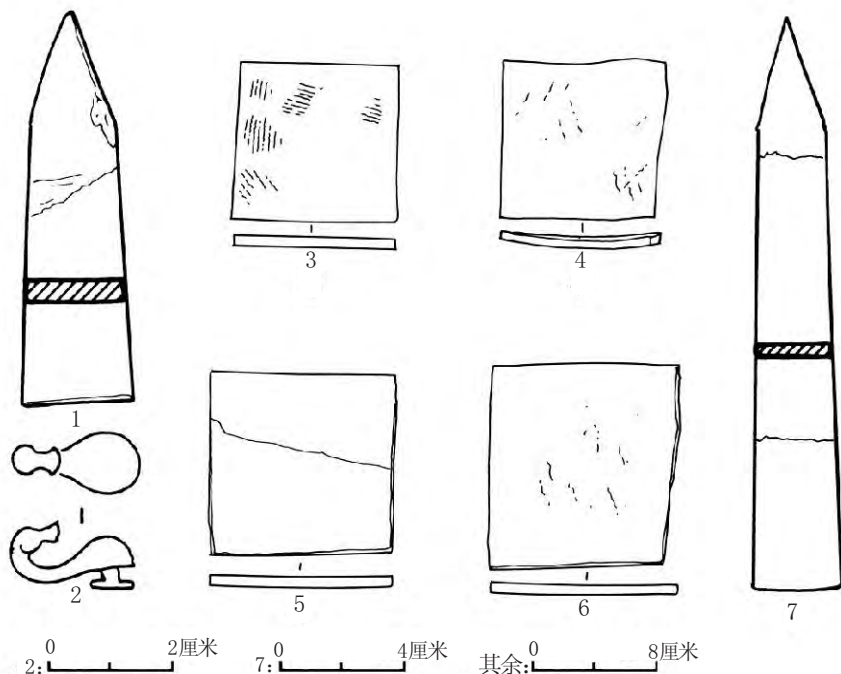
折，束腰，喇叭状圈足，扁平环耳，耳孔较大，上有四圆泥钉。通高4.8口径7、底径6厘米(图五，3)。

高6.2、口径13.6、底径3厘米(图五，6)。

盘、匱 共2件，出土时匱在盘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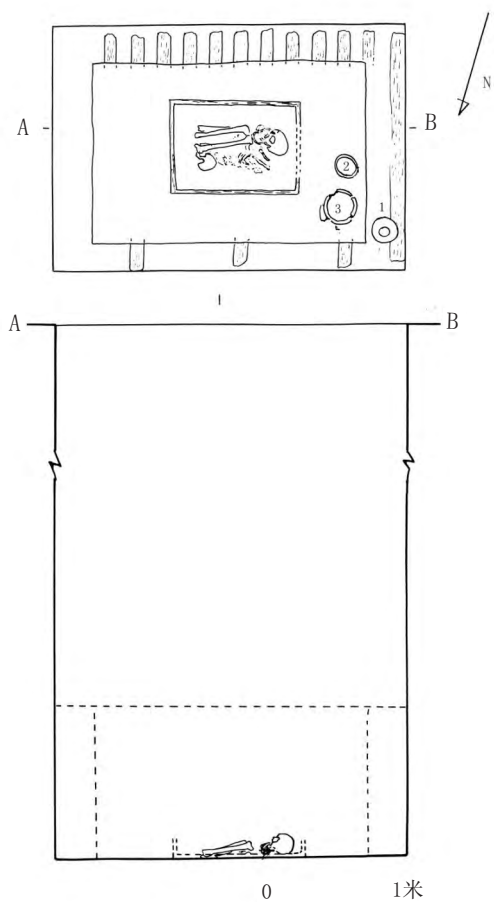
豆 2件，M3:1。泥质灰陶，敛口，斜方唇，盘较浅，盘外斜直，盘内斜收，底近平，中心有凸起。空心粗柄，喇叭状圈足，柄有两道凸棱。通高8、口径7.8、底径7厘米(图五，5)。M3:5，泥质灰陶，敞口，尖唇，盘壁斜直，盘较深，底近平，中心有凸起，空心粗柄，喇叭状圈足。通高8、口径10.1、底径7.2厘米(图五，4)。

盆 1件，M3:2。泥质灰陶，直口微敞，平折沿，尖唇，颈微束，腹微折，下腹急内收，小平底，素面。通



图六 M3出土器物

1. 石圭 (M3:8) 2. 铜带钩 (M3:9) 3-6. 陶板 (M3: 6; M3:16; M3:17; M3:18) 7. 陶圭 (M3:12)



图七 M4平、剖面图
1. 罐 2. 釜 3. 盆

M3:10. 泥质灰陶, 体呈椭圆形, 后部有不规则圆形柄。长8.4、宽6、高3厘米(图五, 7)。

盘, M3:10. 泥质灰陶, 侈口, 方唇, 斜直腹, 平底, 素面。盘口呈不规则圆形。通高3.8、口径10.6、底径7.5厘米(图五, 8)。

陶板 共4件, 方形或不规则方形。M3:6, 边长10、厚0.7厘米(图六, 3); M3:16, 边长10.2、厚

0.6厘米(图六, 4); M3:17, 边长11.8、厚0.7厘米(图六, 5); M3:18, 边长13.4、厚0.7厘米(图六, 6)。

陶圭 共4件。泥质灰陶。形制相同, 锐角三角形圭尖, 体长方形。标本M3:12, 长18.6、宽2.8、厚0.4厘米(图六, 7)。

铜带钩 1件, M3:9. 琵琶形, 鸭嘴形首, 钩座截面呈椭圆形, 圆形钮居中间偏尾处。长4、宽2、厚1.6厘米(图六, 2)。

石圭 1件, M3:8.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, 圭身为梯形。长12.5、宽0.3~3.6、厚0.7厘米(图六, 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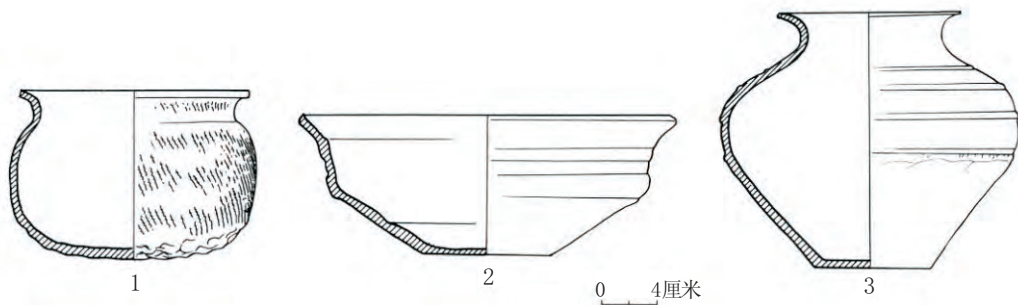
肆号墓

M4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, 方向255°。东西长2.7、南北宽1.9、深8.7米, 四周有熟土二层台, 东宽0.32、南宽0.3、西宽0.28、北宽0.2米, 墓葬填土经夯打。葬具为一椁一棺, 椁长2.1、宽1.4、高1.2米, 棺长1、宽0.7米, 高度不详。墓主为男性, 仰身屈肢, 上肢骨内折屈, 双手斜交置于腹部, 下肢的肢骨和胫骨正面折屈, 并置于上腹部。随葬品共3件, 均为陶器釜、盆、罐。罐位于椁盖板上, 釜、盆位于墓室东北角棺椁之间(图七)。

罐 1件, M4:1. 泥质灰陶, 侈口, 方唇, 平折沿, 沿面有一凸棱, 束颈, 溜肩, 圆鼓腹, 下腹内收, 平底。肩腹饰四组阳弦纹。通高18.2、口径13、最大腹径21、底径8.2厘米(图八, 3)。

盆 1件, M4:3. 泥质灰陶, 敞口, 卷沿, 方唇, 颈微束, 下腹急内收, 小平底。器表饰四道阴弦纹。通高10、口径26、底径8.8厘米(图八, 2)。

釜 1件, M4:2. 夹砂灰陶, 侈口, 方唇, 束



图八 M4出土陶器
1. 釜(M4:2) 2. 盆(M4:3) 3. 罐(M4: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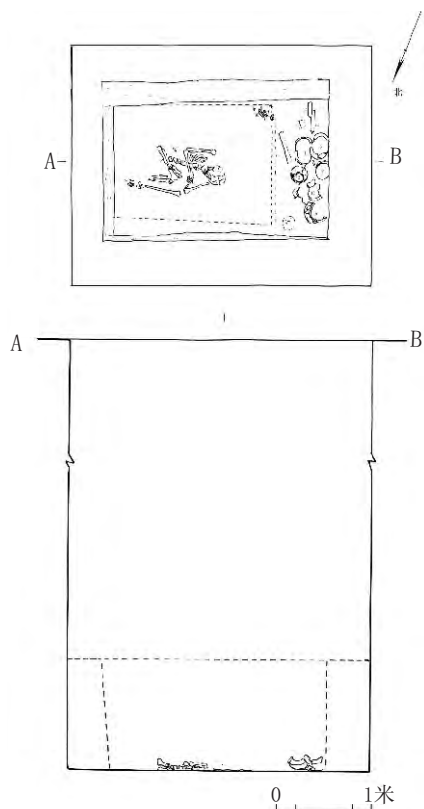
伍号墓

M5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，方向245°。东西长3.15、南北2.5、深9.8米，墓葬填土经夯打，四周有宽大的熟土二层台，二层台东宽0.46、南宽0.34、西宽0.4、北宽0.45、高1.15米。葬具为一椁一棺，椁长2.4、宽1.67、高1.15米，棺长1.7、宽1.2米，高度不详，有头箱，长1.46、宽0.6米。墓主侧身屈肢，面向北，双手环抱于胸前，墓主性别不清。随葬品主要有陶鼎1、陶鬲2、陶盆1、陶罐1、小口罐1，铜带钩1、铜镞1、铜簪1以及骨簪1、石圭4等14件，鬲、盆、罐、鼎等位于头箱内，铜带钩等位于棺内西南角（图九）。

鼎 1件，M5:1。泥质红褐陶，敛口，尖唇，球形深鼓腹，三蹄足。长方形附耳，附耳上有长方形孔，腹上部有两道宽凹槽。通高20.6、口径16厘米（图一〇，1）。

鬲 2件，M5:12。夹砂灰陶，敛口，翻沿外折，双唇，唇面中间有一凸棱，扁体、圆肩、鼓腹，三小乳足，裆部低平。足及裆部饰麻坑，腹饰交错绳纹。通高12.8、口径19厘米（图一〇，5）。M5:5，夹砂灰陶，直口，方尖唇，唇面中间有凸起，扁体，圆肩，鼓腹，裆部低平。足根及裆部饰麻坑，余饰交错绳纹。通高17.2、口径20厘米（图一〇，6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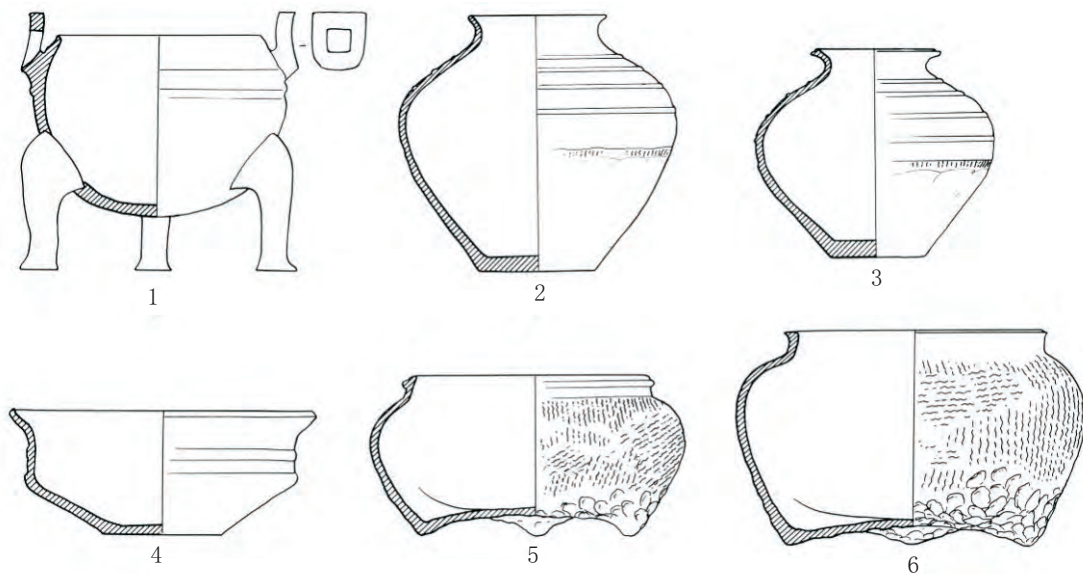
盆 1件，M5:3。泥质灰陶，敞口，卷沿，方唇，颈微束，下腹急内收，小平底。器表饰三道阴弦



图九 M5平、剖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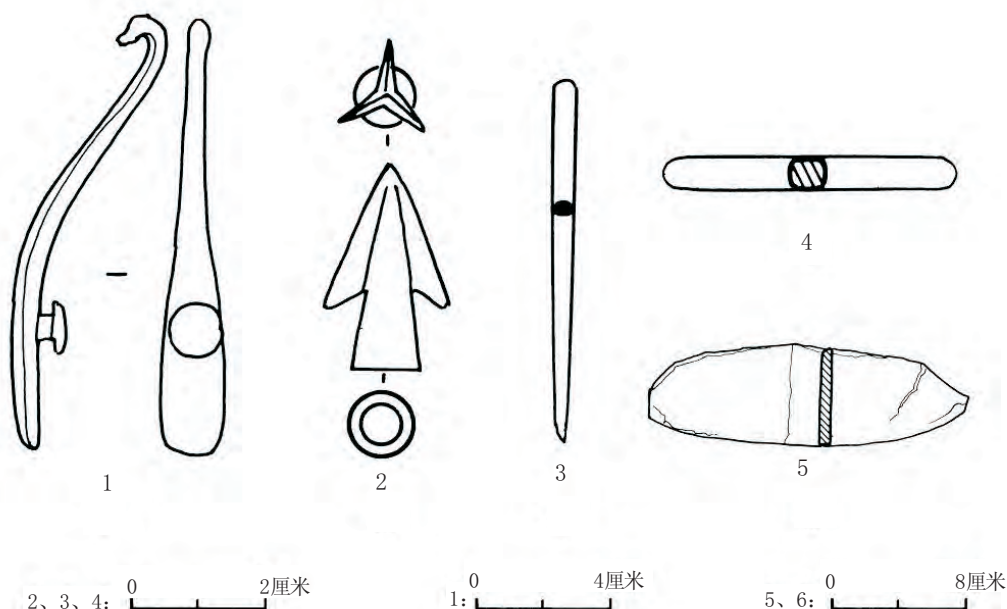
1. 鼎 2、4. 罐 3. 盆 5、12. 鬲 6. 铜带钩 7. 铜镞
8、9、10. 铜簪 11. 骨簪 13、14、15. 石圭

颈，弧腹，圆底近平。腹饰斜向绳纹，颈部绳纹被抹平，底为大麻点纹。通高12.2、口径16.3厘米（图八，1）。



图一〇 M5出土陶器

1. 鼎 (M5:1) 2、3. 罐 (M5:4; M5:2) 4. 盆 (M5:3) 5、6. 鬲 (M5:12; M5:5)



图一— M5出土器物
1. 铜带钩 (M5:6) 2. 铜镞 (M5:7) 3. 骨簪 (M5:9) 4. 铜簪 (M5:11)
5、6. 石圭 (M5:14; M5:13)

纹。通高9.8、口径24、底径9.6厘米(图一〇, M5:13, 锐角三角形圭尖。长29、宽4、厚0.5厘米(图一一, 6)。

侈口罐 1件, M5:4。泥质灰陶, 侈口, 圆唇, 束颈, 鼓肩, 圆鼓腹, 下腹内收, 平底。肩饰四组弦纹, 下腹局部残留绳纹。通高20.4、口径12.8、最大腹径22、底径9.1厘米(图一〇, 2)。

小口罐 1件, M5:2。泥质灰陶, 侈口, 双唇, 平折沿, 沿面有一凸棱, 短束颈, 圆肩, 圆鼓腹, 下腹内收, 平底。肩腹饰四组凸弦纹, 下腹局部残留绳纹。通高16.5、口径9.3、最大腹径19、底径7.3厘米(图一〇, 3)。

铜带钩 1件, M5:6。曲棒形, 断面呈半圆形, 鸭嘴形钩首, 背面中部偏后有一圆柱形钮。长12.8、宽0.7~1.8、厚1.6厘米(图一一, 1)。

铜镞 1件, M5:7。脊呈圆锥形, 脊上起三棱刃, 圆銚。长3、翼宽1.9、銚径1厘米(图一一, 2)。

铜簪 1件, M5:11。长方形体, 两端略呈圆弧形, 表面磨光。长4.3、径0.5厘米(图一一, 4)。

骨簪 1件, M5:9。细长锥形体, 一端圆形, 另一端较尖。长5.3、直径0.6厘米(图一一, 3)。

石圭 4件, 可分为两型。A型, 1件, M5:14。不规则形, 一端微尖, 另一端略圆。长18.6、最宽5.9、厚0.6厘米(图一一, 5)。B型, 3件。标本

结语

战国秦墓在乾县系首次发现, 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, 丰富了关中地区秦墓的分布范围。M3随葬仿铜陶礼器组合为鼎、簋、豆、盘、匜, 簋器底上升到口沿、成假腹, 匜为桃形, 这些器物形态具有战国早期的特点^[1]。鼎腹较深, 又具有稍晚的特征, 据此推断M3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时段。M4随葬日用陶器为釜、盆、罐, 釜圆腹、束颈、底有大麻点, 具有战国晚期的特点。M5陶器组合为鼎、鬲、盆、罐, 鼎为附耳、深腹、无盖的特点, 与凤八CM5陶鼎相似^[2], M5:12鬲翻沿外折, 裆部低平, 足及裆部饰麻坑, 也具有战国晚期的特点。M5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。传统认识上关于秦中小型墓葬使用圭的情况, “即用圭比例在战国中期锐减, 战国晚期以后绝迹”^[3], 而夹道秦墓圭的使用情况与此大致吻合, 这一点也成为墓葬年代判别的依据。

通过发掘情况判断, 乾县夹道M3秦墓应为一座“同穴合葬”墓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, 中小型秦墓“同穴合葬”的材料较少, 报道过的主要有陇县店子M72^[4]、华县东阳M33^[5]、咸阳黄家沟Ⅱ区M19、咸阳黄家沟Ⅰ区M24^[6]、茅坡邮电学院M99、茅坡邮电学院

M109^[7]、渭南阳郭庙湾 M36^[8]、襄阳王坡 M116与 M117^[9]等,上述墓葬的年代多集中在战国中晚期,而乾县夹道 M3 年代为目前发现最早,这为秦墓“合葬”尤其夫妇同穴相葬制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。

据考古调查材料,今乾县城以东二公里处有好峙村,即西晋以前好峙县城所在地,村北一公里有上旦村与底旦村,两村之间有已圯废的祀天之地“好峙”遗迹,与墓地隔河相望的秦汉“梁宫”遗迹也被发现,表明文献所载战国时期秦人在好峙一带活动的据实性。根据上述几座墓葬的年代及地理环境位置来看,很有可能与战国秦置“好峙邑”的历史时代背景相关联^[10]。

本次发掘过程中承蒙乾县文物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,谨此致谢!

领队:田亚岐

发掘:田亚岐、耿庆刚、苏庆元、方开祥、
赵永民、冯健、郭强等

绘图:赵富康

执笔:田亚岐、耿庆刚、苏庆元

注释:

- [1] 尚志儒:《秦国小型墓的分析与分期》,见《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》(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)。
- [2] 韩伟:《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年1期。
- [3] 梁云:《战国时代的東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》第72页,文物出版社,2008年。
- [4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陇县店子秦墓》第72、83页,三秦出版社,1998年。
- [5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华县东阳》第272页,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- [6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秦都咸阳考古报告》第595、613页,科学出版社,2004年。
- [7]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:《西安南郊秦墓》第182、185页,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4年。
- [8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、渭南市考古研究所:《陕西渭南阳郭庙湾战国秦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博》2011年5期。
- [9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襄樊市考古队等:《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》第71页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- [10] 袁富民、田亚岐:《好峙县初置年代考》,此文收录于新编《乾县县志》“历代文献”章节,乾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,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3年。

(上接第48页)甚至唐代至明代多次出现‘却贡’的事例,被官方拒之境外。另一方面,狮子作为瑞兽形象,长期与中国‘灵物’共居显位,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,并向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扩散,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象征。”^[13]唐人打破传统习俗,毅然将外来的狮子取代了老虎,作为最神圣的守卫者,这里包含着唐代对外开放,从一切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巨大热情。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,应算是中华民族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的体现。

注释:

- [1] 《后汉书》卷3《章帝纪》第158页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- [2] 《全唐文》卷138,中华书局;李昉等编:《文苑英华》卷131《狮子赋》,中华书局,1996年。

- [3] [12] 《全唐文》卷398第4061页,中华书局。
- [4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陕西历史博物馆、礼泉县昭陵博物馆编著:《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》第126页,科学出版社,2004年。
- [5]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:《唐金乡县主墓》,文物出版社,2002年。
- [6] 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下第50页。
- [7] 井增利、王小蒙:《富平县新发现的唐墓壁画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7年第4期。
- [8] 李昉等编:《太平预览》卷889《兽部一》,中华书局,1960年。
- [9] 《初学记》卷十五《乐部上杂乐第二》第579页。
- [10] 《唐会要》卷32《宴乐》第711页。
- [11] 《大唐西域记》卷11,“僧伽罗国”条下记载的“执师子传说”。
- [13] 蔡鸿生: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第195页,中华书局,1998年。